

江村调查与 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文集

周晓虹 张 静 乐 江 主编

江村调查与 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文集

周晓虹 张静 承江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的中國化：費孝通“江村調查”80周年紀念文集 / 周曉虹，張靜，樂江主編.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3

ISBN 978 - 7 - 5201 - 4079 - 9

I. ①江… II. ①周… ②張… ③樂… III. ①社會科學 - 中國 - 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298037 號

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的中國化

——費孝通“江村調查”80周年紀念文集

主 編 / 周曉虹 張 靜 樂 江

出 版 人 / 謝壽光

責任編輯 / 張小菲

出 版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群學出版分社 (010) 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環中路甲 29 号院華龍大廈 郵編：100029

網址：www.ssap.com.cn

發 行 / 市場營銷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裝 /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 開 本：787mm × 1092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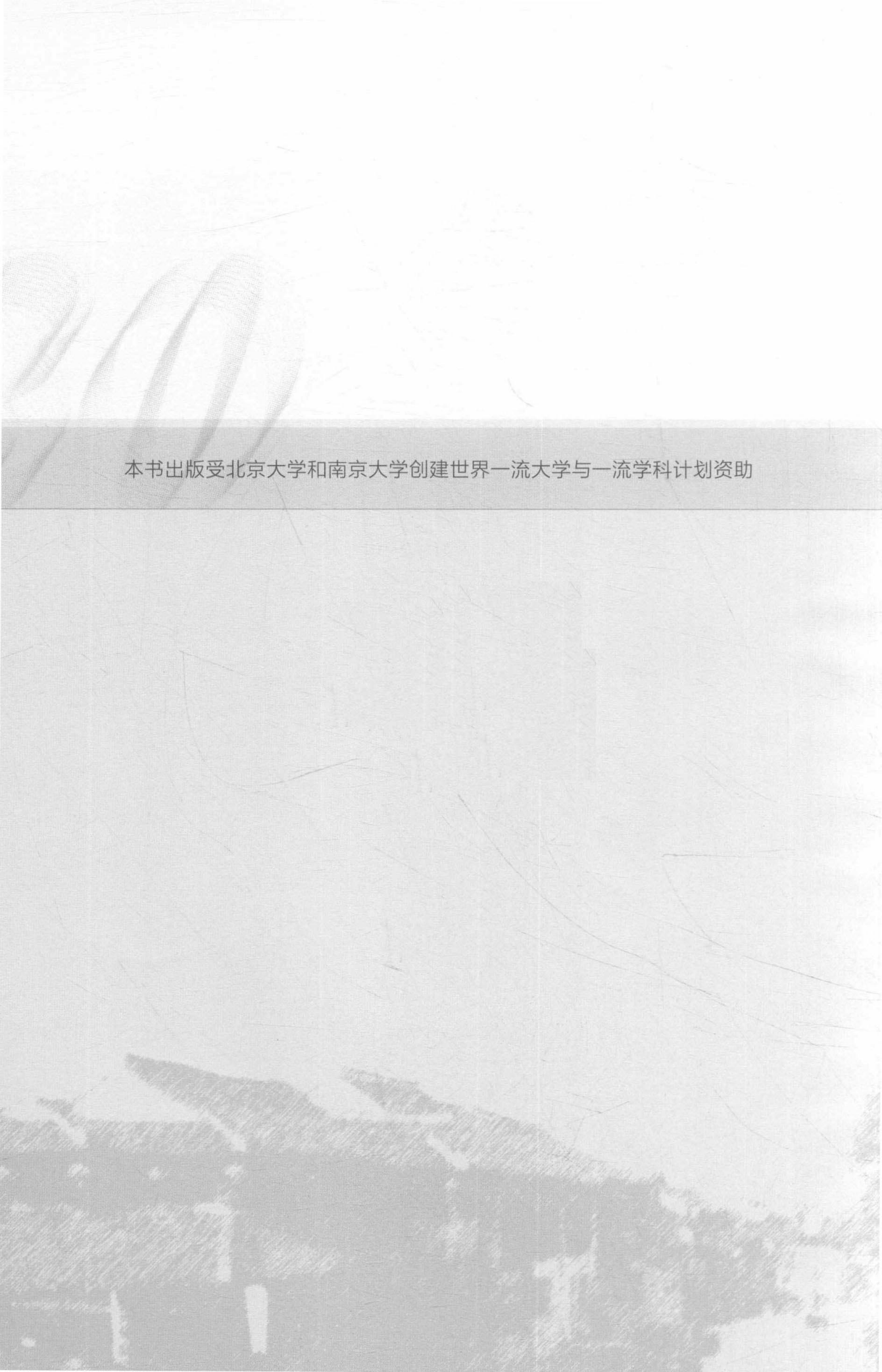
印 張：32.75 字 數：66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978 - 7 - 5201 - 4079 - 9

定 價 / 168.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讀者服務中心 (010 - 59367028) 聯系



本书出版受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计划资助

序 言

1936年夏天，在广西大瑶山花篮瑶调查中失去新婚妻子的费孝通，应在吴江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合作社的姐姐费达生之邀，利用出国前的两个月空隙，去乡下疗养身心，在不经意间开始了后来闻名遐迩的“江村调查”。两年后，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年轻的费孝通写成了《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欲图“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并借此刻画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趋势。1939年，这部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题、由罗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不但当时因对“文野之别”的跨越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开山之作，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成中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以下简称《江村经济》）后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年代里最具典范性和感染力的作品。

岁月如梭，一晃80年过去了。2016年适逢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为纪念这一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中共吴江区委宣传部，在10月22~23日的金秋时节，于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假借太湖大讲堂和太湖群学书院，联袂举办了“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20余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学子和普通民众，围绕江村调查的缘起与社会背景、江村调查的理论与方法蕴意、江村调查与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江村调查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推动、江村调查的学术与社会影响，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论意义、云南三村与乡土中国研究及追随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铺陈，贡献了110场讲演！在研讨会召开的那几天里，太湖之滨、开弦弓村旁到处都是热烈的讨论与会心的切磋，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22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主持，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中共吴江区委书记梁一波，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翼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中国吴江区委宣传部部长乐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们对费孝通教授80年前对开弦弓村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以及其后“江村调查”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给予高度肯定。在随后及闭幕式上安排的7场主题讲演中，次年7月出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来自费孝通先生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王斯福教授、曾长期担任韩国人类学会会长的首尔大学的光光亿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的佐佐木卫教授、吉林大学的邴正教授，以及主办方——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两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朱苏力和翟学伟，围绕江村调查形成的研究范式、差序自我、乡土中国研究与文化自觉、《江村经济》中体现的田野调查方法、多元一体文化观，以及费孝通思想中同样常为人关注的“差序格局”理论做了精彩论述。

在22日下午、22日晚上和23日上午的三个时段中，主办方安排了18场分论坛和7场青年论坛，共计103场讲演。18场分论坛的主题分别涉及江村经济（两场）、差序格局、文化自觉、学术史（两场）、宗教研究、经济与消费、土地与乡村、本土化、乡村政治、费孝通与现代性、家庭与代际关系、家庭与城镇、文化与乡土变迁、心理与政策、城镇研究，以及江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7场青年论坛则涉及农村生活、江村调查、乡村再调查、云南三村、乡土重建与差序格局、家庭与城镇，以及民族与经济结构。这些讲演和报告不仅反映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所开创的中国社会学传统一代代薪火相传，而且体现了社会学重建后中国几代社会学家直面社会现实的探索勇气和脚踏实地的学术品格。

研讨会结束后，为了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各位学者的精彩分析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我们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相商，出版这部《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的中國化——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根据研讨会的110场讲演，我们选择了36篇论文汇集成册。《文集》大致可以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的5篇论文与“江村调查”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张静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指出燕京学派尝试以专业研究者的角色，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注入新的活力和思想；孙飞宇梳理了费孝通在“江村调查”前的思想转变，即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郭大水研究了《江村经济》对经典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超越；佐佐木卫认为《江村经济》在调查方法和分析框架上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深刻影响；而王建民则通过江村调查探究了费孝通的学术心态史，由此述及了个人与学术和国家之间的关联。

第二部分的8篇论文也都与“江村调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晓虹认为江村调查体现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意识，是社会科学中國化或本土化有意识的努力。金光亿、李建新、周飞舟和方文的4篇论文，接续周晓虹论文的前半段主题，以不

同的方式讨论了文化自觉的形成途径及养成方式，其中不乏细致的探索和耐心的勾连，由此瞥见了费孝通思想形成的草蛇灰线；而谢立中、王勋和冯钢的论文则讨论了周晓虹论文的后半段主题，他们从江村调查、费孝通一生的研究对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追求，一直讨论到更为抽象的社会学的中国知识问题。

第三部分的5篇论文全部述及“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论述中国乡土社会特征时提出的独特概念。王斯福的论文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比较，分析了差序格局这一源自中国亲属制度的地方性概念具有的普遍道德与变动可能；翟学伟梳理了自潘光旦到费孝通或自“伦”（沦）到差序格局的概念起源，并认定这一水到渠成的表述乃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与翟学伟不同，朱苏力认为差序格局只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基本格局，但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格局，更不是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基本格局。此后的两篇论文都涉及由差序格局所引发的群（公共）己关系问题：仇立平从源自自我主义的“己”，讨论了整个社会公共性的建构问题；而郑震以与仇立平相反的方式，提出与费孝通相反的观点，即差序格局并非是费孝通意义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传统中国的德行并非限于“私德”，由此我们也不能以为只有西方意义上的“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

与前面三个部分相比，第四部分的6篇论文主题相对零散一些。包智明和陈占江的论文认为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或契合之点，并富有创造力地将此称为“费孝通问题”。作为一种呼应，金一虹和杨笛以为，费孝通的姐姐、蚕丝专家费达生的一生同样也是追寻现代性的一生。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以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方式踏入现代性之中的，就像费孝通所言，姐姐一直考虑的是“怎样去解决技术现代化和经营社会化的问题”。接下来的两篇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在时间上正好接着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和费达生的蚕丝业实践，张云熙的论文叙述了费孝通抗战期间自英国回来后在云南的农村调查，并讨论了禄村、易村和玉村即所谓“云南三村”调查对以江村调查为开端的中国农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意义；杨渝东的论文则更往后，以抗战后写成的《乡土重建》为契机，讨论了费孝通先生借乡土重建之议题解决中西方文化困境的设想，并因此成为两种文化间的“摆渡人”。随后，褚建芳的论文讨论了费孝通的宗教观。显然，依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宗教观念实际上是人们用以应对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唯因宗教研究以及对生活系统其他部分的研究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其对宗教问题的关照就不能不与“直面生活的人类学”发生勾连。最后的那篇《吴文藻与中国社区研究》，是《文集》收入的唯一一篇出自本科生之手的论文，作者朱晨宇借讨论吴文藻在中国社会学中开创的社区研究，触及了“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所开创的社会学中国化努力。

表述零散的主题总需要更多一些文字，要简述《文集》第五部分的6篇论文同

样不易。前两篇属于个人经验的分享，两位作者回忆了当年追随费孝通先生做研究的经历：杨善华曾随费先生“四访江村”，而且至今完整保存着当年的笔记；李德滨则是在费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黑龙江移民研究的。后四篇论文虽没有与杨善华和李德滨相似的经历，但他们述及的主题则多少与农村这个费孝通一生关注的领域相关：张乐天讨论了如何确定农村研究的主题——如果说费孝通从事江村调查的时代这一主题是传统与现代的接续，那么张乐天后来的成名作《告别理想》一书的主题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公社制度。周燕玲、陈映芳的论文与田毅鹏的论文似乎有某种因果关联：前者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一度炙手可热的“农民工”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指出其具有在发展主义的偏好下，按市场逻辑将农民或农民工劳动力化的倾向；后者则讨论了在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的背景下，乡土公共性的危机与重建之路。最后，周大鸣、廖越的论文从一门新兴的学科——路学切入，讨论了现代交通对聚落方式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

《文集》的最后部分，即第六部分的6篇论文主题比较集中，讨论的是江村调查及整个费孝通学术思想的社会影响。李友梅的论文提出，费孝通的江村调查能够让人领悟一种基于“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足以使我们将之作为一种“江村学”范式来理解和学习；徐珂和刘豪兴的论文则不仅交代了《江村经济》的成稿背景、作者在此后遭受的荣辱，也对“江村学”建立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铭铭的论文最初是应《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编委会之邀而撰写的词条，这16000字的长文确实如其本人所说，反映了他“一直怀有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恢复费孝通先生思想世界之整体面貌的心愿”。接下来，罗教讲和冯帅帅的论文以数据化的方式呈现了费孝通的影响力，他们通过计算范式将数据来源延伸至学术研究领域之外，并因此将费孝通一生的社会影响纳入进来；作为一种补充，周云和彭书婷的研究考察了《江村经济》80年来在英语世界持续不辍的影响——不仅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一著作还影响其他35个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最后，似乎是为《文集》作一个必要的结语，王莎莎的论文以江村调查为原点，考察了80年来的中国乡村研究。总体上说，“以江村为代表的微观社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而学界对江村在各个时期的追踪考察所积累的研究资料，更使得社会变迁的样貌能够在江村人的社会生活中清晰地呈现”。至此，36篇学术论文以各自精彩但又相互契合的方式，完整地呈现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及其一生在中国社会科学进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伟大变迁中的历史意义。

自1984年进入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学位以来，我就一直浸淫在由《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经典文本构建起的费孝通的学术世界中，但真正较为深入地理解费孝通及其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尤其是从2015年年底与北京大学的同人和吴江区委宣传部及七都镇的友人们合作，开始筹备举办

“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来，对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更是与日俱深。我与张静教授在费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一个学术性的纪念会议的想法一经提出便获得了社会学界和吴江各界的热情支持。北京大学的潘乃谷教授、马戎教授是这个会议最早的赞同者；此后，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镇长肖军、副镇长王志萍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查书记不仅在几年前支持我建立了拥有600平方米用房的太湖群学书院，这次还代为联系了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乐江，乐部长对本次会议的召开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同人们——周飞舟、成伯清、吴愈晓、蒋海云、陆远、时昱和曹慧中，为会议的举办贡献了各自的智慧和才干。费孝通先生的家人对会议也给予了积极支持，他的女婿张荣华先生专门委托自己的儿子张喆与会。费先生的后代加上费先生调查时年仅8岁、现在88岁的村民沈宝法先生（《江村经济》一书插页里与费先生合影的小男孩）的出席，使本次会议进一步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自然接续，也使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种悠远的回应。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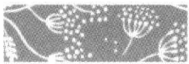
周晓虹

2017年仲夏

于南京紫金山东麓朗诗绿郡寓所



目录



- 001 / 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
——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 张 静
- 007 / 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梳理
孙飞宇
- 019 / 《江村经济》对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融合与方法超越
郭大水
- 029 / 再读《江村经济》：以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为视角
佐佐木卫
- 045 / 个人、学术与国家的关联
——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及其启示 王建民
- 063 / 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周晓虹
- 084 / 从“江村”经由“乡土”到“文化自觉”
——以现代人类学的视角重读费孝通 金光亿
- 100 / 本土化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
——从费孝通江村调查谈起 李建新
- 117 /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周飞舟
- 156 / 文化自觉：超越社会分类的天罗地网
方 文

- 165 / 费孝通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国化
——江村调查给我们的启示 王 勋
- 172 /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类型：以费孝通为例
谢立中
- 181 / 社会学的“中国知识”问题
冯 钢
- 188 / 有关差序自我和费孝通教授的若干思考
王斯福
- 194 / 从“伦”到“差序格局”：关系性与等差性
——潘光旦与费孝通的思想比较 翟学伟
- 210 / 较真“差序格局”
朱苏力
- 226 / 从“差序格局”到“美美与共”
——兼论“差序格局”及其与“公共性”的关系 仇立平
- 249 / 差序格局：自我主义抑或关系人
郑 震
- 266 / “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
包智明 陈占江
- 284 / 现代性的另类追寻
——费达生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社会改革研究 金一虹 杨 笛
- 304 / “云南三村”调查及其当代意义
张云熙
- 313 / 从《乡土重建》来看作为“文化中间人”的费孝通
杨渝东
- 337 / 知识、心态与社会生活
——费孝通的宗教观与“人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褚建芳
- 349 / 吴文藻与中国社区研究
朱晨宇
- 358 / 提高和收获：追忆随费老四访江村若干片段
杨善华

- 365 / 费老教我怎样做移民调查
——从《江村经济》到黑龙江移民调查 李德滨
- 372 / 关于农村研究主题的思考
——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谈起 张乐天
- 377 / “发展”之路：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民工”研究反思
周燕玲 陈映芳
- 392 / 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
田毅鹏
- 407 / 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
周大鸣 廖 越
- 427 / “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
李友梅
- 436 / 江村调查的回顾与前瞻
——兼谈“江村学”的创建 刘豪兴 徐 珂
- 452 / 费孝通和他的思想世界
王铭铭
- 465 / 费孝通学术影响力研究
——基于文本分析技术的数据化呈现 罗教讲 冯帅帅
- 481 / 近 20 年来《江村经济》对英语学界的影响分析
周 云 彭书婷
- 493 / 江村 80 年
——中国乡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莎莎

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

——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

张 静^{*}

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经济》，被称为 20 世纪 30 年代燕京社会学派的代表作。其令人深思之处在于，当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讨论仍未结束，这就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

《江村经济》试图证明，中国乡村的经济结构不是纯粹的农业土地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即分散于农户的手工业和农业相互配合的经济形态。农户把丝织作为副业，可紧可松，随做随置，这样灵活利用了农闲时间，补充了农业收入的不足。如果不是这一补充增加了收入，单靠农业生产，农民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更不可能养得起地主阶级，并支撑起 20 世纪 30 年代城市消费的繁荣。

有评论者由此看出了“不同发展模式”，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乡土工业没有走西方的道路——它不是以更有效率的集中生产方式呈现，而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于乡村农户（甘阳，2007）？这样的提问不是来自实践本身深究缘由，而是来自对立模式的预设——集中化的工业形态与分散化的工农混合形态——两个模式的差异，类似于现代与传统的对设，目标在于指出中国的特殊模式，说明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乡土社会不能成立。

但这似乎并非《江村经济》的意思，而是后来的学者基于模式建构意图，施加的过度演绎。因为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特别指出，机械化丝织业的冲击，使得乡村原本发达的分散丝织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被逐渐摧毁。如果工业化的集中生产在中国无法成立，为何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江浙地区缫丝业纷纷实现机器生产（刘扶英、俞敏敏，2015）？如果有规模的缫丝工业根本无法立脚，那么费孝通观察到的它对“乡村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从何而来？

来自模式对立预设的提问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使用这一对立预设的目标，

*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是学术政治竞争，还是学术研究竞争。指出这两个“竞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于研究目标的必要识别：一个关注学术地位，一个关注事实知识。在研究工作中，这两个目标常常容易混淆，但是它们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事关两个重要认识：第一，农工混合经济形态是一种独特的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不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如果不是为了独特的模式地位，而是基于事实提供认识，那么“农工混合经济形态”为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道路），这个结论就不一定可靠，因为很多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这种经济形态，即使现在，不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仍然保留了部分混合经济形态。如果这一现象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事实，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它们为何是中国特有的“道路”模式。

一 经济形态之社会基础

不妨回到江村的具体案例中，观察当时的一些基础性要件，来看混合经济形态为何存在。在技术方面，比如电力，当时江村是否有充足的电力设备可以支撑纺织机械的集中运转？比如交通，江村的交通方式和工具是否可以支持大批量产品和纺织机械的运输？更重要的是，公共制度对生产活动的组织化，比如商业经纪体制，江村是否存在大量的经纪商，以满足生产方和需求方连接的需要？比如金融体系，江村农户是否可能通过信贷支撑来扩大生产规模？比如信用体系，当地是否存在公共信用的控制体系，用以降低违约的风险？还比如土地买卖、人员流动、信息共享等制度，是有利还是不利于集中工业的出现？

这些条件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着经济形态，因为经济属于合作性活动，它本质上依赖人类的社会组织化进程，并跟随组织关系的变迁而发展。费孝通看到了组织关系变迁问题，他在《江村经济》中指出，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不仅是一系列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系列社会重组（social reorganization）过程。

社会重组相当于社会关系的再造。但如果系统重组的条件尚不具备，经济活动就会主动寻找已有的、方便的形式，用当今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形成相对适应的形态。比如，如果信息共享和信用控制的公共体系未建立，经济活动自然会借用传统社会关系的支持，因为在这种关系里，最方便得到信息、负责、合作和忠诚，以人际信用来降低卸责和欺诈的风险。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关系，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正式的雇佣关系（比如合约制）作用类似，它们都能保护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降低合作风险。

农工混合与集中的工业形态肯定有区别，但它们是不能合流的两个道路方向，

还是一个方向上的不同阶段，需要谨慎回答。即使不考虑产品的性质（一些适合集中生产，另一些适合分散在家户作业），也很难忽略这一条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以称其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支撑才可能运行。比如信用关系作为基础设施的保护作用：在工厂使用合约，在乡村使用关系，方式虽然不同，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一样——增强确定性。经济活动采取哪种形态，取决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变化。如果不是历史地看这些基础条件对于经济形态的限定，怎么会肯定哪种情况是长远的道路模式，哪种情况是暂时适应的结果？对于道路“迥然不同”的过度强调，可能使我们忽略，各种社会解决生存问题的一般性内容：它们都要完成养育人民，创造盈余的任务（伍斯德，2003），没有一个社会是例外的。

为什么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限定了经济形态，使之呈现“农工混合”方式？原因是农民没有真正离开乡间共同体。无论是务工还是务农，他们都还生活在原有的社会组织中，这些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互惠责任、道德原则、信用监督机制，成为经济活动可依赖的制度环境。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正式合约与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种责任约束体系：二者都包含奖励和处罚，以明文声称或潜在意会的方式，规范有关各方的行为。比如，正式合约用抵押、计时、奖金及人事处罚，来抵抗违约行为，而人际关系用不再分享信息和机会、闲话、疏远乃至孤立，来抵抗不负责行为。

显然，经济活动采取什么形态，和社会基础制度有关，也在改变着社会关系。比如今天，当高度流动发生、代际社会关系变化、儿女养老越来越无法依靠时，社区或国家的公共养老体系就不得不提上日程。这说明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单单依靠代际关系，已经无法约束年轻人的传统责任。如果说，乡土社会农工混合是一条独特道路，就如同说家庭养老是一条独特道路一样，它们都有“不变”的假设：房产等经济要素的价值不会变，人口流动不会变，基础性的财富制度——比如土地制度不会改变，与之适应的社会关系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组织惯例不会改变……但无数事实证明，无论人们有多么不适应，这些东西都在经历变革。所以，农工混合式的分散经营，不过是有效利用已有的社会基础条件，解决剩余短缺问题的适应性结果，但不一定是另一道路模式。因为工业化形态源自不同的社会条件，而经济形态会随着社会条件而变化。人类大量的经验证明，以传统的眼光看，有很多到来的变迁是不熟悉的，但未知不等于它不会发生。

二 学派之方法论逻辑

如果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并非独特，那么燕京学派的贡献是不是就是阐明这一

本土化模式？倘若本土化是指挖掘了本地的研究对象，那么几乎所有的地区社会学研究都在这么做。事实上，研究工作的特点正是从不同地点的案例证据中挖出知识。如果研究了某类社会的特征就可称本土学派，那么，吉尔茨发现巴厘岛的“地方信仰体系”，斯科特发现亚洲村社共同体的“集体生存伦理”，艾森斯塔德发现南亚社会的“庇护关系网结构”，……这些研究同样是指出了亚洲社会的某种特点，他们为何没有被看成“南亚本土学派”？显然，单凭研究地点、使用语言或者研究者的国籍民族，并不能构成一个学派的特征要件，要看其是否形成系统的方法论立场（methodological position），因为这一立场为研究者提供了分析逻辑的展开原则。

以《江村经济》为例，可以看到，费孝通的研究依循当时社会科学的一般分析逻辑。①社会现象描述逻辑：区别于泛泛的印象谈论和抒发主观情感，费孝通运用一系列观察及调查数据，客观描述江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尝试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区别开来，把证据和观点区别开来。②竞争冲击分析逻辑：外来机械化丝织业的冲击，使得江村丝织业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分散的副业辅助农业的形态被摧毁：手工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机织洋货，引起了乡村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生存的亦工亦农者失业。乡村土地制度的一些基础性矛盾可能在这一冲击下暴露显现。③均衡功能分析逻辑：江村丝织副业原本的存在，弥补了农业产出和剩余的不足，维护了地租经济的稳定。如果乡村副业的这一功能因素消失，土地分配关系的平衡可能就被打破。④因果关系分析逻辑：高效率的经济形态，比如机械化丝织业，对低效率的经济形态，比如手工丝织业，正在构成摧毁性威胁。⑤制度条件分析逻辑：如果地租分配制度不变，在现有情况下，同时养活地主和农民，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唯有再兴乡村丝织副业，来补贴农户收入才可能。

这几个方面显示，《江村经济》的分析逻辑采用了当时社会科学界认同的方法论立场，而不是独立于或者颠覆它们。即使是“乡土社会”这个概念，也是运用类型比较的结果，而类型比较是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技术之一。费孝通在1985年说，自己的认识来源受《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金，2011）著作的影响。他坦陈，是这本书引导他得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乡土社会之所以“特有”，是和先工业化社会比较的结果。比较得以进行，必定依赖类型划分，因而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特点并不是处理互不相干的现象，相反，是采用一系列学界通用的分析工具，去认识不同对象的特点（Nathan, 1993）。他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比如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能够被不同文化及社会的学者所理解，不在于观点的差异——寻找差异特点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而在于这些不同的特征认识得来，使用的一致方法论立场：社会科学专家共享的类别划分、概念工具以及分析逻辑。

这样，所谓学派或者中国学派的修成，关键并不在于参与者的国籍、使用语言、

研究对象、研究结论以及目标理想的一致，而在于系统的方法论逻辑不同于其他，但其分析效力（存在的合理性）得到大量工作的证实。以此为标准，燕京社会学派使用的方法论，虽然还称不上全面而系统，但相对于当时的国际社会科学主流立场而言，并非独特，而是一脉相承的。

三 燕京学派之独特性

那么燕京社会学派的独特性在哪里？它相对于什么而独特？如果《江村经济》是燕京学派的代表作，那么它显示了当时中国学者不同于以往的问题尝试：试图运用和国际学界共享的类别逻辑和分析框架，来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角色，他说：“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费孝通，2012：24）他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研究需要新角色、提出新问题。

在今天看来，这虽然不稀奇，甚至可以堪称不能再平常的角色，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学问或者派别，以与民众平等的态度，系统地采用经验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现象。之前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精英和君臣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历史实践，较少真正触及基层社会现实，其方法主要是考据、解说、抒意、策论和颂圣，其目标主要在正当性论述、例规引领或者奏折，其价值在以史为鉴提示世人，其角色是教化劝导，包括君臣和大众。但燕京社会学派的工作显然不同于此，从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等学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不同。他们的工作显然有别于从前的目标和方法，但他们使用的概念逻辑体系与传统治学展现了有意识的不同。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色来工作，这是燕京学者偶然的相似，还是意识清楚的作为？观燕京学派的目标阐述可证。1940年，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了“燕京学派”的方法论立场：“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他建议的研究假设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因此，“社区”“文化”“制度”“功能”，构成了燕京社会学作为学派的“概念格局”（转引自胡炼钢，2011）。这些东西显然有别于从前中国学者治学的概念体系。为后人传颂的、吴文藻先生致力的“社会学中国化”工作，一般指的是他主张社会学采用中文教材，培养中国人才，研究中国社区。这三点实际上都是为社会学在中国开展的必备建设，